

# 明清北京休闲文化发展的分期及其影响因素

吴承忠<sup>1</sup>, 韩光辉<sup>2</sup>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休闲产业研究中心, 北京 100029; 2. 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明清时期是北京古代休闲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明时风俗的转变给北京休闲活动带来了巨大影响。明万历以后的北京民风追求物质享受和游乐。清前、中期开发了“三山五园”, 茶馆、酒楼、会馆、庙会、风景游览地等蓬勃发展, 商业剧场开始出现。由于内外分治政策, 外城西区在各类休闲地的建设方面处于北京各区前列。清末, 京剧形成, 而园林等休闲地受到外来侵略军的破坏。从甲午中日海战到清亡之间, 北京进入吸收西方休闲文化的发展阶段。清末北京公园和动物园开放为市民公共休闲空间, 是北京休闲史上的重大事件。

**关键词:**北京休闲文化; 静态休闲; 动态休闲; 消遣性休闲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3)03-0056-07

## 一、问题的提出

李旭旦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指出, 历史人文地理学要重视对古代社会人们感情生活和娱乐生活的研究, 除历史自然地理学和历史人文地理学之外, 以后还会建立历史社会地理学。史念海先生也在《中国古都与文化》一书中注意到古都是各地域文化、中西文化的融汇区, 并分析了隋代和唐代长安音乐和舞蹈艺术、杂技、百戏等特点和变化。二十年来, 我国历史文化地理理论研究还停留在起步阶段。而中国历史地理学中更没有开始对休闲问题展开系统研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在于历史地理学界对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休闲活动的发展状况及其重要性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sup>①</sup>我国的情形与外国相似, 有着漫长的休闲发展史, 休闲活动普遍存在于从贵族、商人、文人到最下层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各阶层, 而且每个时代的休闲活动常有着不同的特点, 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古代、近代贵族和平民休闲文化。

“城市是人类文化集中的聚落和区段, 城市文明以其主导作用制约人类社会。中华文化和区域文化都以城市文化为重心”。<sup>①</sup>由于明清时期是北京作为大统一都城逐渐完善与巩固的时期, 也是休闲功能逐步完善的时期, 休闲活动的繁荣达到了历史高峰。辽金元以来的休闲活动得以以休闲民俗的方

式固定为休闲文化。这一时期具有上承辽金元, 下启民国和新中国的时间特点, 对明清以后北京人的休闲生活影响很大。这一时期也为我们今天的北京留下了大量静态的休闲物质景观(遗产)和动态的休闲活动形式, 其影响十分深远, 故选择明清时段作为北京休闲地理研究的重点。明清北京人休闲生活的研究对以往不被重视的北京城市社会史研究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同时也必将扩展北京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视野。<sup>②</sup>直接研究古代北京休闲文化的论文和专著目前尚未见, 但有一些探讨北京地域文化、民俗方面的文章<sup>③</sup>。孙冬虎、王均则对近现代北京城区教育、书肆、戏曲的文化地理特征作了历史地理学方面的探讨。<sup>②</sup>总体而言, 现有文章和著作从历史学、地理学、旅游学、民俗学、文学、社会史、城市史、艺术史、古都文化<sup>③</sup>、区域文化方面研究的多, 从历史地理学和休闲科学方面深入探讨城市和区域休闲文化的文章和论著还未见。晚清到民国时期北京风俗的介绍性论著多, 晚清以前的少, 真正长时段的研究性成果更少。因此明清北京休闲地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价值。

## 二、明清北京休闲活动、休闲场所的类型

### (一) 休闲的定义

明清时期是北京古代休闲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北京居民可分为三大社会阶层: 皇室贵

收稿日期: 2013-03-21

作者简介: 吴承忠, 男, 湖北武汉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休闲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副教授, 博士; 韩光辉, 男, 山东泗水人,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族、文人士大夫、平民。平民阶层中包括为数不少的军人、匠人、商人。休闲活动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约翰·凯利指出:休闲应被理解为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一个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存在空间,是人的一生中一个持久的、重要的发展舞台。休闲是以存在与“成为”为目标的自由——为了自我,也为了社会。<sup>[4]</sup>在马克思关于闲暇时间定义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休闲,可理解为人们在闲暇时间所从事的消遣性活动,其目的在于寻求精神上的轻松、快乐、自由与解脱。放松、愉悦是休闲活动的本质感受。

本文重点研究主要出于精神放松和娱乐目的的消遣性休闲活动。以户外群体性活动为主,类似于今天所说的游憩活动,重点探讨明清两代北京城市休闲文化发展阶段划分及其特征、影响因素。

### (二)休闲活动与休闲场所类型

明清北京休闲活动的类型包括11种,分别是:郊游活动、帝王的冬狩秋猕活动、行宫、园林与别墅休闲、动物园观赏动物、庙会等宗教娱乐活动、士大夫聚会唱咏、文艺欣赏、节日休闲、茶馆与酒楼宴饮、古玩收藏与交易、民间游艺竞技。明清北京休闲活动场所的类型包括八大类:皇家狩猎地、行宫、园林、风景游赏地,游览型寺庙,园林,庙会与市场,戏园与会馆,重要民间节日期间的公共休闲地,其他类型的休闲活动地(如酒楼、茶馆、滑冰地、妓院、动物园等)。本文的研究地域在今北京市域和相关地区,重点在北京城和近郊。

### (三)休闲文化定义

本研究认为:休闲文化是指休闲行为模式及其产生的文化产物。该定义包含三层含义:一,某一种休闲方式是一种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的反映。二是某些休闲活动本身就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如园林休闲活动、看戏、逛庙会等;其三,不少休闲活动随着逐步的积累而逐渐理论化,进而成为一种休闲文化形态,如斗蟋蟀即是如此。

### (四)资料和方法运用特点

本研究的资料有八大特点:一是查阅了《文渊阁四库全书》中全部和《续修四库全书》中部分明清人的文集,从其中诗集部分寻找到大量有关游览风景地、寺庙和园林的信息,为研究士大夫群体的休闲活动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二是明清的正史、实录、地方志对研究皇家休闲地起到了重要作用。三是明清大量的文人笔记、日记为揭示北京休闲活动和各

类休闲活动地的原貌提供了较为详细的历史材料。四是大量庙宇碑刻拓片为分析庙会的香会地理来源和庙宇戏楼提供了重要基础。五是清末出版的《北京新报》等报纸为我们提供了十分鲜活的休闲历史记录。六是游记、野史、梨园史料、风俗史料、庙会史料、会馆史料汇编为我们揭示明清各类休闲活动地、游览路径等问题也提供了便捷的帮助。七是当代的有关介绍性或研究性著作、论文、北京地方文史资料等杂志为研究提供了参考作用。此外,还有部分资料来自于研究者本人的实地考察,如抄录的碑刻资料等。总体而言,本研究所采用的各类资料量大而种类繁多。初步估计本研究进行过程中共浏览、精读、查阅各种历史文献和当代文献接近一千种,在此基础上引用相关文献近2500处。本研究首次运用历史地理学的历史文献研究法对明清时期北京城市居民的休闲活动进行了初步研究,运用大量文集、笔记、地方志,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和考证方法,初步确定了一些休闲地的地理位置;在此基础上,很好地解决了明清北京休闲活场所的空间分布及其变迁的问题。<sup>[5]</sup>本文则是在揭示了各类型休闲地分布空间特征基础之上进行的休闲学和文化学意义上的分期研究。

## 三、明代北京休闲文化发展的分期及其影响因素

目前国内关于明清两代北京休闲文化发展的分期研究成果还未见。本研究在检索阅读现当代有关明清两代北京的城市社会生活、地方史等研究成果以及明清的古籍文献后发现:明清两朝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均可以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前期政治较为清明,吏治较严格,经济发展势头明显,风俗以朴实为美,休闲文化呈现雅闲和俗闲并重的局面。而后期往往是吏治腐败,社会风俗以奢靡为美,休闲文化呈现俗闲和恶闲并行的局面。这每个朝代的前后期之间往往以风俗的转变风向标,而这里所指的风俗又主要是以休闲风俗为主要内容。休闲风俗是休闲文化的主体。因此我们选择休闲文化发展分期的时间界限倾向于以休闲风俗重大转变为界限。明代休闲文化发展分期可供参考的当代文献主要有:徐明主编的《华夏审美风尚史》第八卷《残阳如血》,陈宝良主编的《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社会生活长卷》,曹子西主编的《北京通史》第3卷一第8卷(辽—清代)等著作,以及大量的梨园史

料、风俗史料、庙会史料、会馆史料汇编。供参考的历史文献更是十分丰富,从正史、实录到地方志、明清文集、文人笔记、游记、日记、野史等,如《治世余闻》《宛署杂记》《万历野获编》《旧京遗事》《松窗梦语》《典故纪闻》《天爵堂文集笔余》《仿洪小品》等。

### (一) 第一阶段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明代北京休闲文化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明成祖迁都北京到明武宗统治时期。时间段是从公元1421年到1521年。整整一百年时间内,该阶段可视为明代的早期和中期阶段。本时期由于政治相对较为清明,吏治较严,有一批正直的大臣为社稷兢兢业业工作,尽管出现了明英宗、明武宗失德和宦官专权,但仍维持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势头,甚至出现了“仁宣之治”的局面。官员们以良好的心态在闲暇时间里到城内和郊外的山水佳地和著名寺庙游览,促进了风景游览地和游览型寺庙的形成。《治世余闻》记明孝宗弘治朝“时朝政宽大,廷臣多事游宴”。<sup>[6]</sup>同时,公侯贵族、官员等也积极建设私家园林,使之成为修身养性的佳处。一般城市居民也在宗教节日和民间节日、甚至在春季长达一月之内畅游庙会和风景地,举行各种文娱活动。这一时期的风俗以朴实为审美取向。这一时期影响北京市居民休闲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和经济状况向好的发展态势以及朴实的社会风尚。

### (二) 第二阶段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第二阶段是从明世宗嘉靖年间到明末。这一时期的世宗朝到神宗朝由于政治上采取了“嘉靖新政”等改革措施,“皇帝的开明、大臣的得力、思想的解放、经济的改革,使这一时期出现了较为宽松的政治局面和较为发达的经济状况……新兴的市民阶层更加成熟了,它对于明代审美风尚的影响是一种不可低估的力量。”<sup>[7]</sup>有这样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官员阶层和包括商人在内的一般城市居民可自由地享受文化娱乐生活。为了满足城市居民和工商业者文娛的需要,在北京街头的说书、弹词、琵琶、杂技也空前兴盛。明“城百巧骈集,争相高尚,即技艺之微,亦往往造极工巧,有古今所无者,嘉、隆之间,因有八绝之号。……李近楼号琵琶绝……王国用号吹箫绝……蒋鸣岐号三弦绝……郭从敬号踢球绝……阎桔园围棋绝……张象象棋绝……刘雄八角鼓绝……刘初善击鼓……苏乐壶号投壶绝。”<sup>[8]</sup>

士大夫更是活得畅快洒脱。《万历野获编》载:“近年士大夫享太平之乐。以其聪明寄之剩技,余

髻年见吴大参国伦善击鼓,真渊渊有金石声,但不知于王处仲何如。吴中缙绅则留意声律,如太仓张工部新、吴江沈吏部璟、无锡吴进士澄时。俱工度曲,每广坐命技。即老优名倡,俱皇失措。真不减江东公瑾。此习尚所成,亦犹秦晋诸公多娴骑射耳。近在都下见王驸马昺、张缙帅懋忠诸君,蹴鞠俱精绝”(“缙绅余技”。)<sup>[9]</sup>史玄也描述了万历时期的士大夫休闲生活场景。“京师诸曹,职业烦猥,然官方不以曹务为事,处安居尊,优游宴乐。神宗时,士大夫文酒从容,雅歌宴会。崇祯中,党人大起,缙绅之贤,讲求门户,而曹司之务,旁委尽废。鸣鸡之辰,骑马出街,营求塞路。天将明,则有客到门,送迎终日。及夜,又有呼庐斗彩之会,飞觞引满,耗竭神情,虽职司章奏,无虑万端,亦但主吏奉行,官曹初不省视”。<sup>[10]</sup>总体而言,明代后期北京市居民休闲状况和休闲文化受宽松的政治环境、发展的经济状况影响较大。

### (三) 风俗转变对休闲的影响

政治和经济状况的改变也会给民风民俗带来直接影响。我们应该看到明代前后两个阶段风俗的转变给休闲活动带来的巨大影响。明万历以后的北京民风明显呈现追求物质享受和游乐的特点,体现在对衣食住行、游乐、婚丧嫁喜等方面的奢华上。《松窗梦语》云:“语云:‘相沿为风,相染成俗。’……第习俗相沿久远,愚民渐染既深,自非豪杰之士,卓然自信,安能变而更之?今两都,若神京侈靡极矣,金陵值太祖更始,犹有简朴之遗。至于诸省会,余所历览,率质陋无华,甚至纤啬贫窳,即藜藿不充,何暇致饰以炫耳目?吾杭终有宋遗风,迨今侈靡日甚。”(“风俗纪”)<sup>[11]</sup><sup>139</sup>可见明末都城的奢华习俗是和当时全国大城市的气候相一致的。比如,百姓服饰的变化就可见一斑。早在明宪宗时即有官员看到了这一趋势。“成化时,九卿以灾异陈言,内一款:‘军民服色器用,近多僭越,……今四方丝贵金少,率皆坐此。……此侈风在今更甚,尤宜禁止。’”<sup>[12]</sup><sup>268</sup>到嘉靖时期更是难以控制。“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如翡翠珠冠、龙凤服饰,惟皇后、王妃始得为服;……今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拟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风俗纪”)<sup>[11]</sup><sup>140</sup>。士大夫中也以着华丽衣物为荣。“故相江陵公,性喜华楚。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虽李固、何宴,无以过之。一时化其习,多以侈饰相尚。……近年公卿间例遵朴

素。”(“士大夫华整”)<sup>[13]</sup>建园林、兴私家乐班教歌舞、收藏古玩成为一时风尚。“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如吴中吴文恪之孙,溧阳史尚宝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则嵇太史应科。云间则朱太史大韶,吾郡项太学锡山、安太学、华户部辈,不吝重资收购,名播江南。……惟分宜严相国父子、朱成公兄弟,并以将相当途,富贵盈溢,旁及雅道。于是严以势劫,朱以货取,所蓄几及天府。……今上初年,张江陵当国,亦有此嗜。……而所收精好。……亦不旋踵归大内,散人间。时韩太史世能在京,颇以廉直收之”(“好事家”)<sup>[14]</sup>士大夫所建园林由明初的简朴风格转向了壮观华丽。明后期兴起的建园热潮中,“而园林建筑更是靡极土木,奢华至极,或犖石疏渠,或黄石垒山,以供冶游”<sup>[15]</sup>如此,就不难明白米万钟在有了古云山房、湛园、漫园后何以还要建设如此宏丽的勺园了。明薛冈言:“北土名园,莫多于都下;南中名园,莫盛于西湖。”

不仅如此,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也在被冲垮。宦官、和尚、道士往往娶妻养妾,与妓女相游乐,甚至僧道骗钱盗财的事也屡屡发生。<sup>④</sup>此风在明景泰年间就开始呈现,云南虚仁驿驿丞曾上疏言时政,云:“今年以来,释教盛行,满于京,络于道路,横于郡县,遍于乡村。鞞鼓士民,诱煽男女,廉耻道丧,风俗扫地。……此盖前自掌邦礼者,屈于王振之势,今年曰度僧,明年曰度僧,百千万亿,日炽月盛,今虽云止度裁抑,不过示虚文应故事而已。臣以为宜尽令长发,勒使归俗务农,庶邪术不兴……。”<sup>[16]</sup>明英宗复辟后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天顺初年,留守左尉小旗陈福奏:“以在京观之,寺观动至千百,僧道不可数计,求财索食,沿街塞路,张挂天神佛像,擅言祸福,以盖造寺观为名,务图肥己,饮食酒肉,宿歇娼妓,无所不为。……抑且有伤风化。乞在内令巡城御史、五城兵马司,在外令巡按御史及有司等官拿问发落……。”<sup>[12]31</sup>此建议得到了英宗的批准。这样的社会风气表现在休闲活动中的例子如四月戒台山庙会期间北京妓女逛秋坡,和尚逛妓棚。

#### 四、清代北京休闲文化发展的分期及其影响因素

清代北京休闲文化发展的分期依据与明代相同。清代北京休闲文化发展分期可供参考的当代文献主要有蒋广学、张中秋:《凤凰涅槃》等著作,以及

大量的梨园史料、风俗史料、庙会史料、会馆史料汇编。供参考的历史文献也如明代十分丰富,从正史、实录到地方志、文集、文人笔记、游记、日记、野史等,如清人文集、笔记、报纸等,如《帝京岁时纪胜》、《北京新报》等等。

清代北京的休闲文化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顺治朝到乾隆朝,公元1644年到公元1795年(乾隆六十年)。二是从嘉庆皇帝到清末,从公元1796年到公元1911年。这样的分期明显反映了国家的盛衰。龚自珍认为自乾隆末年以来,整个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种动荡不安的形势,他概括说:“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蹙。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又或餐菸草,习邪教,取诛戮或冻馁以死,终不肯治一寸之丝,一粒之米以益人。承乾隆六十载太平之盛,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甚者。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sup>[17]</sup>

##### (一)第一阶段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第一阶段可视为清朝前期和中期,为清朝政治、经济、文化从稳定到全面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休闲文化的发展有几个值得关注的特点。一是康熙乾隆三代大力开发北京西山和海淀一带,形成“三山五园”的皇家园林格局。这一事件的直接影响是促成了海淀镇商业城镇和园林经济的繁荣,海淀富商、豪贵、官员私家园林区的建设,西山私家园林进入高潮,为清末最终形成北京西郊园林密集区奠定了基础。北京城内也是园林休闲之风很盛,尤以万柳堂文人名士毕集诗酒唱和成一时之盛,甚至成为后世文人士大夫无限神往的盛景。由于经济的原因,最著名的园林多形成于此时期。二是清人游风很盛,无论各种节日均结伴出游。三是茶馆、酒楼、会馆、庙会、风景游览地的蓬勃发展;外地戏班纷纷进京而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近代意义上的剧场在酒楼中开始脱胎而出。如乾隆二十年左右,“帝京园馆居楼,演戏最胜。酬人宴客,冠盖如云,车马盈门,欢呼竟日。霜降节后则设夜座。昼间城内游人散后,掌灯则皆城南贸易归人,入园饮酌,俗谓听夜八出。酒阑更尽乃归。散时主人各赠一灯,哄然百队,十五成群,灿若列星,亦太平景象也”<sup>[18]</sup>由于清朝的内外分治政策,外城西区在各类休闲地的建设方面处于北京各区前列。这样的休闲文化发展特征明显是清帝国前期繁荣强大给都城休闲带来的正面

影响和反映。

## (二) 第二阶段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第二阶段是清朝的晚期。此阶段清朝进入多事之秋,朝政腐败,民力日益困穷,灾害频发,农民起义层出不穷,国内危机四伏。而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政府与英国、法国政府签定的不平等条约使这个向来以“天朝帝国”之称的封建国家蒙上了耻辱。而咸丰十年(1860年)爆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则使一代名园和北京城遭受了重大摧残。1862年到公元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北京处于短暂的“骤雨初歇期”,外国入侵的直接军事威胁有所减弱。这一时期洋务派开始兴办西学、办工商实务,铁路、轮船、邮政等业务有了实质性进展。这一时期,京师人口剧增,城市寄生性特征明显,风俗如明代后期一样有奢靡化倾向,北京风俗在园林、戏园、茶馆、酒楼、风景游览地、庙会等方面继续呈发展的态势,而京剧在咸丰年间得以形成。其中1860年英国、法国联军侵占北京期间对市场和西郊园林、海淀镇的经济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而从1895年的甲午中日海战,到1911年清亡之间北京休闲文化的发展进入到吸收西方休闲文化的发展阶段。中日甲午战争和《中日马关条约》的签定给清朝政府以更大打击。维新变法运动在1898年展开并以失败告终。随后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城,给前门大栅栏一带的商业、以及北京城的一些王府和高官的著名宅第园林以较大损坏,北京经济受到了打击。此后的妙峰山香会陷入了一个衰落期是这种影响的直接表现。这一时期会馆成为了维新派人士的日常活动中心。这一时期部分士人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介绍以及中外交流的频繁使得外来休闲文化开始在北京有了生存的土壤。兴办京师大学堂,1905年停废除科举考试的取士制度,近代新型商场—劝业场的兴建,放足、剪辫等新生活解放运动,使民众对西方文化的排斥态度有所降低。同治末年,照相艺术从西方传来北京。光绪十八年(1892年)北京最早的照相馆丰泰照相馆在琉璃厂土地祠(今南新华街小学地)正式对外商业服务。照相本是一项应日常生活或工作需要而设的一项服务,但对于清末好奇的北京人来说,无疑成为了一种新的休闲方式。照相技术后传入宫中,深受慈禧太后、光绪、珍妃的喜爱。电影在1895年12月28日诞生于法国后八个月,“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八月,在北京文明茶园放映了西洋影戏,

这是北京最早放映的电影”。<sup>[19]</sup>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一外国人携带放映机和影片在前门外打磨厂福寿堂放映了影戏。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中国人林祝三第一个从外国进口影片、影机,在打磨厂天乐茶园放映了电影。大栅栏的大观楼、庆乐茶园、三庆园、文明茶园、东安市场的吉祥戏园、外城西区的口袋底胡同新丰市场的和声戏园也随后放映了电影。1905年,正泰照相馆摄制了谭鑫培出演的京剧舞台记录片《定军山》,为中国人拍摄的第一部电影。<sup>[20]</sup>1911年正月新丰市场庆升茶园、地安门外地安市场内天和戏园都接有电线以放映电影。<sup>[21]</sup>如《北京新报》记载当时演出情形。“于初十日晚头天开演平安电影,男女参观的不下千余人,电影还开没开呢就起哄了,不是你挤了我啦,就是……。”<sup>[22]</sup>此外,西洋音乐会也开始面向公众演出。1911年6月,时有新闻告知公众:“顷有著名音乐大家施哥拉君曾在德国音乐大学毕业,……前在欧洲各处奏演,……前已抵京,拟于本月初十晚上九点半钟假座六国饭店开言音乐会,北京士庶届时当以一聆为快”(音乐大家到桌)。<sup>[23]</sup>

清末北京公园和动物园的开放是北京休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中国封建社会中,平民百姓从来没有自己的纯粹意义上的公共休闲地,庙会的狂欢也是借着宗教的名义。历代政府也从未在城市空间中规划公共休闲地。光绪二十六年(1904年)外城东区东厂胡同原两广总督瑞麟宅第园林漪园在经历庚子之变的蹂躏后改名余园,设立饭庄、茶室、照相馆等,对社会开放,成为北京历史上第一家公园。而位于西直门外乐善园(今北京动物园东北部)的万牲园创建于1906年到清末,为两江总督端方创办,集合了国内和德国的一批动物。1908年对外开放,其建园目的在于“籍以开通知识,供学理之参考”。清末公园和动物园的开放也意味着随着封建时代的衰亡,公民社会的时代亦将来临。北京人的休闲史将谱写现代文明的篇章。由此可以看到,清代后期北京城市居民的休闲则直接受到外来休闲文化的冲击和帝都休闲奢靡之风的影响,北京特色的休闲活动和休闲场所空前发展,休闲文化达到很高的高度,乃至国剧——京剧诞生。

## 五、结语

明清时期北京休闲文化的发展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这一时期各种类型的休闲活动、休闲场

所以休闲服务业发展迅速,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类型特色各异的休闲文化遗产,为目前北京人乃至中国人和世界游客开展文化休闲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这一时期的休闲文化发展分期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特征密切相关,呈现不同的发展特征。具体而言,这一时期北京休闲文化的发展特征是都城性质和功能(消费性城市、人口构成、区域历史人群、城市空间结构、开放性和融合性)、民俗文化(休闲民俗、消费观念)、政治(政策等)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北京作为一个地方军事重镇或是地方政治中心,与其作为全国大统一时代的都城相比较对城市休闲发展的影响之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明朝重建了宫殿区、在太液池南端开挖了南海,用其土堆筑了景山,成为全城的制高点和观景点。南海子、大功德寺行宫、西湖边好山园的建设,对隆福寺、护国寺、朝天宫、历代帝王庙等皇家庙宇的敕建也进一步完善了北京市域的休闲功能。清代帝王则在西山园林和海淀皇家园林的建设上作出了卓越贡献。北京北部前往承德避暑山庄沿线的行宫也为成为北京皇家休闲地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总之,元朝以后北京经济、政治功能的进一步强大对北京休闲地景观的建设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筑外城,北京城于是分为内城和外城,形成“凸”字形的外形。外城的形成使得金鱼池园林区和前门外大街、宣武门外大街市场区、前门大街以东的商人住宅区和会馆集中区得以形成。清代满族实行的旗民分城而治的政策使得外城宣南一带成为高密度汉族士人集中区、商业发达区和休闲娱乐区,外城西区甚至成为全城的休闲中心。民俗文化对北京城市居民休闲的影响也十分明显。休闲与生活民俗、岁时民俗、信仰民俗、游艺民俗、文艺民俗均有直接关系,尤其是游艺民俗、文艺民俗的内容完全可称之为休闲的民俗。其中娱乐性消遣性行为均是休闲行为。从另外角度而言,一些休闲方式形成以后长期固定下来而成为民俗的一部分,并且就是以民俗的方式在不断地传承。还应该看到由于北京城的开放性,明清时期大量外地人口尤其是高层次文化人口的进入,使得地方风俗进入京城,并对北京的风俗产生影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代苏州风俗对北京城上自宫廷下至平民百姓的影响。北京本地风俗的变化对北京休闲发展的影响也很大。明代和清代中后期的史家均发现了北京风俗由俭入奢、由勤业到好嬉游的变化。正是由于以上诸多因素的影响,才

创造出独特而丰富的明清北京休闲文化,并继续影响着明清以后的北京城市居民休闲活动和休闲发展。

#### 注释:

- ① 直接研究中国休闲文化的文章并不多。如《隐逸文化与文学休闲功能》《唐代致仕与休闲文化》《唐都长安休闲娱乐文化发展的背景考察》《清代吴地的旅游消费与旅游业的勃兴》《唐代行官考逸》《读〈洛阳伽蓝记〉论北魏洛阳的寺庙园林》《唐代园林别业考补》。从历史学和民俗学角度来研究古代中国与娱乐相关的习俗的文章不少,如《中原民间庙会文化简论》《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妙峰山香会的世俗价值》《话说“放灯火儿”》等。研究游戏的有萧放:《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民间游戏娱乐》等。
- ② 目前关于社会生活史方面的优秀研究成果,如熊月之:《稀世富矿: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的价值》;李长莉:《上海社会生活史的典型意义》;钱杭:《“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的三个关键词》;罗苏文:《近代上海:多元文化的摇篮》;马学强:《传统上海城镇社会生活刍议》,均载《史林》,2002年第4期;王迪:《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以成都为例》,《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消逝的太阳—唐代城市生活长卷》《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腐朽与神奇—清代城市生活长卷》《北京城市社会生活史》《康乾时期北京人的社会生活》《宋代市民生活史》《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等。
- ③ 如《迷人的北京文化庙会》《竹枝词与北京民俗》《北京清真饮食文化与北京的清真餐饮业》《京剧与北京文化》《论北京民俗文化史的分段及特点》《试论北京文化的嬗变与社区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满族文化对京师文化的影响》等。
- ④ 朱国桢:《涌幢小品》下,“僧道之妖”条,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7页;[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下编,卷二十六,“道士娶妻”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97页。

#### 参考文献:

- [1] 皮明麻. 城市史研究略论[J]. 历史研究,1992(3):5.
- [2] 王均. 现象与意象:近现代时期北京城市的文学感知[J]. 北京社会科学,2002(2):28-31.
- [3] 如向达.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M]. 上海:三联书店,1957.
- [4] 约翰·凯利. 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M]. 赵冉,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3.

- [5] 吴承忠. 明清北京休闲地理研究[D].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2005.
- [6] 陈洪谟. 治世余闻[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53.
- [7] 徐明. 华夏审美风尚史: 第八卷[M]//残阳如血. 开封: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38.
- [8] 沈榜. 宛署杂记[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61: 299.
- [9]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 卷二十四[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627.
- [10] 史玄. 旧京遗事[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6: 13.
- [11] 张瀚. 松窗梦语[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12] 余继登. 典故纪闻: 卷十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268.
- [13]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 上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316.
- [14]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 下编, 卷二十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658.
- [15] 陈宝良. 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社会生活长卷[M].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6: 102.
- [16] 余继登. 典故纪闻: 卷十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26.
- [17] 龚自珍. 西域置行省议[M]//龚自珍全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73.
- [18] 潘荣陛. 帝京岁时纪胜[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1: 33.
- [19] 杨桦, 任自斌. 老北京的电影业[J]. 燕都, 1986(3): 27.
- [20] 蒋广学, 张中秋. 凤凰涅槃[M]. 开封: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41.
- [21] 北京新报. 宣统三年正月初六日, 1911. 2. 4.
- [22] 北京新报. 宣统三年正月十一, 1911. 2. 9.
- [23] 北京新报. 宣统三年, 1911. 6.

责任编辑: 王咏梅

(E-mail: wym@jhun. edu. cn)

## The Staging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eisure Culture Development in Beijing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y

WU Cheng-zhong<sup>1</sup>, HAN Guang-hui<sup>2</sup>

(1. Leisure Industry Research Center, Foreign Economic and Trad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9;

2. School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was the prosperous time of leisure culture development in ancient Beijing. The change of custom brought tremendous influence on leisure activities in Beijing. The folk in Beijing after Wanli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pursued material enjoyment and pleasure.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three hills and five gardens were constructed, teahouses, restaurants, assembly halls, temple fairs, landscape spots developed well, commercial theater began to appear. Because of the policy of dividing-rule for Han town and Man town, the western area of the outer city located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districts of Beijing in all kinds of leisure sites building.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Beijing opera formed, while gardens and other leisure sites were destroyed by foreign invaders. However, From the Sino-Japanese naval battle to the collapse of the Qing Dynasty, Beijing went into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absorbing western leisure culture. The park and Beijing Zoo were opened as public leisure space, which became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s in the leisur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Beijing.

**Key words:** Beijing leisure culture; passive recreation; dynamic recreation; recreational leisure